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让全球化 造福全球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美]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 / 著

雷达 朱丹 李有根 / 译

谢亚凡 / 校

当代世界学术

让全球化 造福全球

[美]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 / 著

雷 达 朱 丹 李有根 译
谢亚凡 /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让全球化造福全球/(美) 斯蒂格利茨著; 雷达, 朱丹, 李有根译; 谢亚凡校.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10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ISBN 978-7-300-14698-0

I. ①让… II. ①斯… ②雷… ③朱… ④李… ⑤谢… III. ①经济全球化—研究 IV. ①F114. 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24594 号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by Joseph E. Stiglitz

Copyright © 2006 by Joseph E. Stiglitz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 2011 by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让全球化造福全球

[美]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著

雷 达 朱 丹 李有根 译

谢亚凡 校

Rang Quanguihua Zaofu Quang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18 插页 2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96 000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同时，我们又推出了这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系列，旨在译介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我们希望经过不断的筛选和积累，使这套丛书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本套丛书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淘洗，加之判断标准见仁见智，以及选择视野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推荐，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前 言

《全球化及其不满》(*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是我离开世界银行后不久所写的一部著作,从1997—2000年,作为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我在世界银行工作了3年,在此之前的1993—1997年,我曾作为威廉·杰斐逊·克林顿(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总统麾下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和主席在白宫工作。在那本书中我按照历史的顺序记录了我在世界银行和白宫的所见所闻。那真是一个喧嚣跌宕的时代:1997—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将一些最为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推向了前所未有的衰退和萧条;在前苏联,本以为从共产主义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能够带来新的繁荣,但其结果却是出现了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下降,下降程度达70%

以上；即使在最佳状态下，这个世界也不再是歌舞升平，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而发展中国家也未能竭尽全力增进它们自身的福祉。而我越来越坚信，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非但没有尽其所能通过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之类的国际组织所做的工作，来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相反在某些时候还使得它们的生活变得更为艰难，像 IMF 的方案很明显使东亚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而在前苏联及其加盟共和国一度推行的“休克疗法”也是造成转型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我涉猎了许多这样的论题。在白宫和世界银行工作的时候，我亲眼目睹了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内幕情形，并且我们与发展中国家并肩努力，帮助它们完善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的战略。因此，我认为自己对于这些议题能够提供一些独特的见解。除此之外，同等重要的是，作为经济理论家，我花了近 40 年的工作时间去理解市场经济的力量和它的局限；我的研究不仅对有关市场效率的一些一般性论调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同时也对关于全球化的一些基本信条（如自由贸易是提高福利的必要条件）产生了怀疑。

在前一部著作中，我描述了国际金融体系及其机构的缺陷，并解释了为什么说全球化还没有达到它理应、并且能够使更多的人从中获益的目标。我也勾勒了为使全球化更为有效所必须做的一些事情，特别是针对贫穷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必须做的事情。那本书中还包括了对世界金融体系以及治理该体系的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的建议，但是由于篇幅所限，我尚未进行充分的论证和说明。

在白宫和世界银行的经历不仅使我能够站在一个独特的立场来了解全球化所存在的问题，而且它还为我这部续作打下了基础。在华府工作期间，我出访世界各地，拜会各国领袖和政府要员，了解到全球化的成功与失败之处。在我离开华府回到学术界的那段日子里，我仍然热衷于有关全球化的争论。2001 年，我因早期在信息经济学方面的理论成就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从那之后，我又造访了十几个发展中国家，继续保持我和这些国家的学术界、商业人士、国家元首、政府总理以及议员之间的交流，并参加了有关全球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问题和全球化问题的论坛。

在我准备离开华府赴世界银行之际，克林顿总统仍挽留我继续留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内阁成员。我婉言谢绝了他，因为我认为能为消除困扰不发达国家的赤贫而设计政策、制订计划，这是一项意义更为重

大、更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在一个物质丰富的世界里，还有很多人生活得如此贫困，这样的不平等现象是非常可怕的。解决这些问题无疑困难重重，但是我有信心为消除这个不平等现象做些工作。我之所以接受世界银行的邀请，是因为这不仅为我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机会，还为我能够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提供了一个平台。

在世界银行的那段日子，我开始理解为什么目前的全球化进程引起了如此强烈的不满。通过全球化获得发展具有可能性，但不具有必然性。我看到在一些国家，贫困不但没有被遏制，相反其程度还有所上升；我更看到这其中更深的含义，贫困程度的上升不仅仅是统计数字变化，更为重要的是民众实际生活质量的下降。当然，没有灵丹妙药能根治这一社会顽症，但是我们所做的许多改进，对政策、经济制度、游戏规则和思维方式的改进——使人们对全球化更好地发挥作用，尤其是对发展国家更好地发挥作用仍然寄予希望。有些变革出现是无法抗拒的，例如，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进入全球舞台和印度在外包领域的成功，正在推动着政策和思维方式的转变。在过去的十年全球金融市场已经被打上了不稳定的标签，1997—199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新千年伊始的拉美危机、2003年开始的美元走软等，这促使我们对全球金融体系进行再认识。我在后面的一些章节中所提到的世界范围内的变化迟早都会发生。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样或那样的变革是否会发生，而在于这些变革什么时候发生、是在下一次全球灾难降临之前还是之后发生，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为了应对危机而迅速采取的一些相机的变革并不是改革全球经济体系的最佳方式。

冷战的结束意味着新机会的出现和旧障碍的消除，市场经济的重要性现在已经得到公认，苏式共产主义的失败意味着各国政府可以从意识形态的争斗转向修正资本主义的问题。如果美国能够善用这个机会，以一定的原则和价值观为基础，诸如促进贫穷国家发展的贸易协定等，来建立国际经济和政治体系，就能惠及全世界。然而，发达工业国建立的国际贸易体系，实际上只是帮助它们获取特殊的集团利益和金融利益，而受到伤害的往往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而所谓的争取第三世界在“道义上和情感上的拥护”根本不值一提。

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实际上，针对IMF和其他国际经济组织的主要批评之一就是它们“包治百病”的政策处方，这样的政策抓不住也不可能抓住发展问题的复杂性。虽然对全球经济的描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其中也有一些基本的原则。许多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



政策也有共性，这些共性也是与每个国家自身所处的环境相符的。本书的写作目的之一就在于解释这些共性。

这里需要提一下我的早期研究与后期著作之间的联系。早期研究主要是指为我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以及我在华府时期的政策立场，后期著作主要指的是《全球化及其不满》和《喧嚣的九十年代》（*The Roaring Nineties*）。^①

我早期的学术研究主要在于不完全信息和有限信息的影响以及不完全竞争，它使我认识到市场是有局限性的，我和其他一些学者用了几年的时间将这一成果拓展到了宏观经济学领域。在公共经济学领域，我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在强调政府和市场之间需要平衡，这个观点与克林顿政府的政策主张很接近，在任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期间，我帮助将这些政策主张清晰地写进年度《总统经济报告》（*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当我来到世界银行时，世行还在推行诸如社会保险私有化的保守主义政策，IMF 的情况也是如此，亲身所见，不甚困惑，这与我在白宫苦苦为之奋斗的目标截然相反。更为离谱的是，他们所使用的模型，正是我所做的大量理论工作已经证明了不可信的东西。（当然，我也为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也在推行这类政策而倍感困惑。）

我的经济学研究已经揭示了 IMF 经济学以及“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所固有的深层次缺陷，他们相信市场本身能产生经济效率。基于我早期学术研究的一贯认识，迫使我不得不对他们推行的政策发表意见，在我看来，世界银行的东亚政策只能使事态进一步恶化。如果我不尽我所能地指出这些问题那将是一种责任的沦丧。

在我供职于克林顿政府期间，我们为之奋斗的东西不仅与美国人民相关，也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相关。当我离开克林顿政府赴世界银行时，我继续为在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之间找到一个正确的平衡点而努力，并提出了促进平等和充分就业的政策。我在世行任职期间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得到了世行许多经济学家的热情回应，这些问题也正是我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提到的。

① 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在我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及在此之后的时间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直在企图诋毁我，而不是进行理智的辩论。IMF 试图给大家造成这样一个印象，即我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的论点与我在世行任职期间的观点前后不一，没有比这更离谱的了。（我应该感谢他们对我的书反应激烈，在世界大多数地方，这都提高了该书的销量，甚至其中一个国家的出版商在书的封面引用了 IMF 对我的攻击。）

由全球金融危机和东欧向市场经济的艰难转型所引发的不满情绪已经慢慢退去，在今天，人们能够以更加平和的心态来看待这些问题了，就像我在本书第一章所描述的那样，在许多关键性的问题上人们正在达成一致，而这种一致的认识与我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所提出的思想有相似之处。那本书的目的在于改变有关如何重塑全球化的争论的思路，那些观点有相当一部分现在已被广泛接受，就连 IMF 也转而认可了我的观点，即允许投机资本不受限制地流动是极端危险的。当然，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地方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冲突告诉我们，在经济学和基本价值观上仍然存在着许多分歧。实际上，我对国际经济组织的主要批评之一，是他们总是无视环境的差异而一味地主张一种特定的经济观点，我认为，这种观点从许多方面来看都将误入歧途。

这本书反映的是我对民主进程的信心，我相信一个信息通畅的公民社会可以提供某种检查手段来制约特殊利益和金融集团的恣意妄为，这些集团支配着全球化的进程；而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普通市民是可以在改善全球化的过程中分享共同利益的。我希望本书和前一本书一样，能够转变全球化的争论焦点，最终转变塑造全球化的政治进程。

全球化业已成为彰显重大社会矛盾的场所，包括基本价值观上的冲突，而其中最重要的矛盾是关于政府和市场的作用。

保守主义者通常援引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主张，认为市场以及追求私利的行为似乎能通过“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产生经济效率。即使他们承认市场自身并没有产生全社会都能够接受的收入分配结果，但他们认为效率和公平问题应该分别对待。

在保守主义者看来，经济学是关注效率的学问，至于公平问题（就像美丽往往只存在于欣赏者眼中一样）应该留给政治学去研究。今天，对于市场原教旨主义进行学术捍卫的现象已近乎绝迹。^①我在信息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已经表明，在信息不完全的时候，特别是当信息不对称时，即一些人知道的事其他人总是无法知道时，我们之所以看不见那只“看不见的手”，是因为这只手根本不存在。^②如果没有政府适当的监管

① 我必须说明的一点是，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失去了知识基础，报纸专栏作家、权威人士，甚至偶尔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他们有时还祈求用经济“科学”来为他们的立场辩护。

② 在我获得诺贝尔奖时我提到了这项研究。

和干预，市场是无法产生经济效率的。^①

近年来我们已经看到了对这些理论洞见的生动写照。就像在《喧嚣的九十年代》一书中所刻画的那样^②，追求私利的 CEO 们、会计师们，还有那些投资银行，他们的行为并没有产生经济效率，相反却导致了大规模的投资失误以及与之相伴的泡沫，一旦泡沫破灭，而泡沫总是一定会破灭的，其结果是经济衰退。

今天，从大体上来讲，如果不是在政治家中也至少在经济学家之间，已经形成了市场具有局限性的认识。上个世纪 90 年代在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出现的金融丑闻摧毁了“美国式的金融资本主义”长期依赖的支柱。更宽泛地说，人们已经意识到华尔街的观点往往是短视的，是与经济发展背道而驰的，经济发展需要长远的考虑和计划。

人们同样也越来越认识到资本主义也不止有一种形式，其经济运行也不是只有一种“正确”的模式。市场经济的其他模式也是存在的，如瑞典模式就维持住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并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社会结果，在那里人们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享有很好的医疗服务，贫富差距也不明显。尽管瑞典模式在其他地方不一定有效，也不一定适合某个具体的发展中国家，然而它的成功表明存在着其他的有效市场经济的替代形式。在有替代和选择的情况下，处于决策中心的应该是民主政治程序，而不应该是专制统治。我对国际经济组织的一个主要批评在于，他们总是以缺乏权衡取舍的政策空间为借口，似乎只有一套政策能改善所有人的经济状况。而实际上，经济学的精髓在于能够在不同的方案之间选择，在可供选择的空间中，一些方案只对某个利益集团（如外国资本家）有利，另外一些集团则要为此付出代价，而另外一些方案则是将风险强加于某个利益集团（如工人），而利益却归他人所有。

在所有社会都会面临的选择中，政府的作用是一个中心问题。经济成功要求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有一个好的平衡。政府应该提供哪些服务？是否需要公共的养老金计划？政府是否需要某些特殊部门实行激励以鼓励其发展？政府应该采用哪些法规，如果有这样的法规，来保护工人、消费者和环境？这种平衡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也会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存在差异。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在亦已存在的全球化进

① 参见 Bruce Greenwald and Joseph E. Stiglitz, “Externalities in Economie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nd Incomplete Marke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1, no. 2 (May 1986), pp. 229 - 64.

② 参见 Joseph E. Stiglitz, *The Roaring Ninetie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3.

程中，实现这种必要的平衡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我同样希望向人们说明的是，全球化已经沦为推行一套特殊的价值观的工具，虽然这种批评是正确的，然而，全球化却并非注定如此结局，全球化不一定是造成环境破坏、贫富差距加大、多元文化削弱的罪魁祸首，不一定要牺牲普罗大众的幸福来维护特殊集团的利益。在《让全球化造福全球》一书中，我力图说明，只要适当地加以管理，全球化是能够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时获得巨大利益的，而这种适当的管理模式在大多数成功的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

对全球化以及与之管理方式有关的失误与不平等现象所持有的态度，是对不同国家及其国民心态进行罗夏测试（Rorschach test）的很好的途径，它揭示出他们的基本信条和态度、他们对于市场和政府作用的观点、他们心目中社会公正的重要性以及非经济价值观的权重。

那些认为消除收入差距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的经济学家，多数会倾向于认为，政府着手消除贫困的行为成本很高，甚至也可能适得其反。这样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也总是相信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本身是有效率的。在他们看来能够改善贫困状况的最好、最简单的办法是让经济增长，只要经济增长，其增长的利益总会不知不觉地惠及贫困阶层。（即使经济研究成果已经动摇了这种观点的理论基础，他们还是固执己见，真是可笑。）

另一方面，像我这样的同道中人认为，市场通常不能产生有效率的结果，制造的往往是诸如过度污染和基础研究匮乏等结果，而且市场也会受到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程度恶化的干扰。我们这些人还认为，减少收入差距的成本并不像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估计的那么高。出于对不均等和贫困的担忧，我们看到的是对贫困和不均等置之不理所产生的巨大成本，即包括隔阂、暴力和社会冲突在内的社会后果。这些人对政府可能的干预满怀希望，尽管政府干预的效率有时或很多情况下会低于人们的期望，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引人瞩目的成功案例，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对某些成功案例进行讨论。所有的人类制度都不是完美的，对于每一种制度而言，挑战在于人们能否从成功和失败的经历中总结出经验和教训。

在应对不均等和贫困问题的重要性方面，认识上的不同折射出了对不均等和贫困问题产生根源的观点上的差异。大体上讲，那些关注不均的人认为，不均等是运气造成的，运气好的人降生时便具有良好的基因



或豪门背景（“遗传学上的六合彩”）^①，或者在正确的地点、正确的时间（在石油冲击之前或在当地房地产泡沫形成之前）购买了不动产。^②而那些不太关心不均等现象的人认为，财富是对人们辛勤劳动的回报，在他们看来，收入的再分配不仅夺去了对工作和储蓄激励，而且几乎也是违背社会道德的，因为它剥夺了个人的公正回报。

上述态度也反映在他们对待其他许多问题的立场上。那些不关心不均等问题而热衷于经济效率的人总是对诸如社会公正、环境问题、多元文化、大众医疗和消费者保护等非经济价值观漠不关心。（当然，也存在许多例外的情况，如保守主义者对环境问题还是给予了关注。）

我之所以强调经济和文化取向上的联系，是为了说明这一问题与我们所委托的经济决策者有着很大的关联，如果你将决策权赋予了“保守主义者”，那么，你所得到的经济政策及其结果必然反映了他们的政治利益和文化价值观。^③ 本书集中反映了我本人的价值观及其判断标准，至少我希望坦诚地向读者呈现现有的经济争论中的两派观点。

从全球化的鼓吹者手中拯救全球化

在 70 年前所发生的大萧条中，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形成了他的就业理论。在该理论中他详细阐述了政府应该如何行动才能使经济恢复充分就业和增长。凯恩斯在当时遭到了保守主义者的诋毁，因为在保守主义者看来，凯恩斯的主张提升了政府的作用。他们揪住经济低迷时期不可避免的预算赤字不放，一有时机便削减政府的项目。然而，在拯救资本主义制度方面，凯恩斯的贡献比崇尚市场经济的金融家们加在一起的总和还多。如果依照保守主义的政策建议，大危机的情况将会进一步恶化，经济衰退的程度会更深，其持续时间也会更长，而要求改变资本主义的势力也会发展壮大起来。出于同样的原因，我相信除非我们认识到全球化的问题并开始着手

① 慈善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一种表述。

② 参见 Matthew Miller, *The Two Percent Solution: Fixing America's Problems in Ways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Can Love*,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3。米勒在书的序言中这样表述问题：“我们先退一步，研究运气在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影响，以及认真对待生命的‘胎定运程’将如何带来我们进步所需要的共鸣，以此来奠定一点哲学基础。”

③ 同理，不能把这些关键的社会决策交给技术专家官员。本书中对全球化的一个关键批评就是全球化试图将很典型的政治决策“去政治化”。

应对这些问题，否则维持目前的全球化趋势将会变得非常困难。

尽管全球化的背后存在着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势力，但是，同经济发展问题一样，全球化也并非一种必然的进程。有许多指标表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球化无论在发展速度还是在发展的广度上都放缓了步伐，甚至出现了倒退，例如，以贸易量占 GDP 的指标衡量，在这一期间贸易确实在下降。^① 如果全球化的结果使一个国家的多数或绝大多数国民的生活水平下降，或者如果全球化的发展威胁到了基本文化价值观的存在，这时必然会产生要求放缓或终止全球化进程的政治力量。

当然，不仅可以通过思辨的力量和经验的总结（例如关于贸易或资本市场的自由化是否能够促进增长的观点以及对这些改革活动的实践经验）改变全球化的路径，同样一些全球性事件的发生也会改变全球化的路径。近年来，“9.11”事件、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已经对有关全球化的争论进行了全方位的重新定义，对于这种定义的方式，我将会作进一步的探讨。

本书不仅阐述了如何运用经济学来构建经济制度，同样涉及了经济制度形成中政治学的运用。经济学家们相信动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强烈的动机和巨大的机会将经济制度和政治程序导向这样一种模式——某些人从中获利而让多数人承担成本。

公开的、民主的程序是能够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权力的，我们有能力使伦理观回归到商业领域中，公司治理不仅可以维护股东的权利，而且可以维护受到公司行为影响的其他人的权利。^② 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一旦被卷入了全球化，他是能够理解全球化如何才能发挥作用，或者说最起码也能够理解如何使全球化运行得更为有效这样的问题，因此，他们会对他们的政治领袖在重塑全球化方面提出相应要求。我希望本书有助于将这种美好的愿望变为现实。

① 正如我们将要在第三章中阐释的，随着生产和贸易构成的变化，全球化的基本经济动力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② 许多欧洲国家已经将这些观点纳入到公司治理中。我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表达的意见在外行人看来似乎是合理的，但的确是有高度争议的，特别是在美国学术界。在一些极端的条件下，公司价值（或者说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可以带来经济效率，而大多数经济学文献只是集中研究这些极端的例子。然而，只要不完全信息或不完全市场存在，股东福利的最大化既不会带来经济效率，也不会带来一般福利。比如参见 Sanford J. Grossman and Joseph E. Stiglitz, "On Value Maximization and Alternative Objectives of the Firm," *Journal of Finance*, vol. 32, no. 2 (May 1977), pp. 389 - 402.



致 谢

从撰写《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开始，在过去四年多的时间里，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全球化的人越来越多，对他们我深表谢意。除了国际经济机构中的朋友，尤其是在那本书中提到的在世界银行工作的人，现在我还要特别感谢尼克·斯特恩（Nick Stern）和弗朗索瓦·布吉尼翁（François Bourguignon），他们接替我成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继续和我一起从事有关发展进程的研究。我要感谢前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素帕猜·巴尼巴滴（Supachai Panitchpakdi），他与我完成了大量有关发展回合方向的研究。还要感谢瑞典教育部长利夫·帕格罗茨基（Leif Pagrotsky），他在任职瑞典贸易部长时为建立一个更为公平的

贸易机制而带头呼吁；我还要感谢前欧盟贸易委员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现任 WTO 总干事），特别是他对于“非军火贸易自由化倡议”（Everything But Arms Initiative）的观点；还要感谢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署长的凯末尔·德尔维什（Kernal Dervis），因为他使我可以与世界银行联系得更紧密；还要感谢国际劳工组织（ILO）的胡安·索玛维亚（Juan Somavia），他组织成立了全球化社会影响世界委员会，他的报告成为改变对全球化的看法的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标志。

在准备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又回访了以前参观过、研究过并提到过的地方，并感受到了巨大变化的发生，其中包括阿根廷、埃塞俄比亚、泰国、韩国、中国、俄罗斯、哥伦比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墨西哥、越南、厄瓜多尔、印度、土耳其和巴西。同时，我回到之前只是走马观花地浏览过的国家重新考察了一次，比如孟加拉国和尼日利亚，另外，之前没有机会去的国家这一次我也参观了一下，包括玻利维亚、马达加斯加和委内瑞拉。我万分感谢相当多的政府官员（从首相或总统一直到财政部长和经济顾问）、教师、商界人士以及那些捐赠组织和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的朋友毫不吝惜地付出了他们的时间。本书中反映了他们的很多想法。

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已经以不同的形式在世界各地的研讨会上阐述和讨论过。我要特别感谢希腊前外交部长乔治·帕潘德里欧（George Papandreou），他召集学术和政治上的领导人举行一年一度的研讨会（即锡米岛座谈会），从而使有关全球化的议题总是可以引起人们的注意；还要感谢梵蒂冈社会科学院，在这里我们讨论了有关债务的问题；另外还要感谢英联邦，邀请我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安德鲁·查尔顿（Andrew Charlton）一起负责研究什么才是贸易谈判中真正的发展回合，并为我们的研究提供资助。同时，我还要感谢联合国大会主席、英联邦财政部长、WTO、全球发展中心以及世界银行，他们邀请我将研究发现展现给大家。本书各章的观点能够在世界性研讨会和国际会议上发表，我自己也获益匪浅。改革全球储备体系的观点就曾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执行委员会、2006 年 1 月在波士顿召开的美国经济学会会议、2001 年 12 月在瑞典召开的研讨会（与乔治·索罗斯一起），以及 2005 年 9 月在拉科鲁尼亚召开的西班牙经济学家协会年会上阐述过。知识产权机制及其改革建议中出现的问题，则在 2004 年 10 月首尔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召开的最不发达国家部长级会议和 2005 年 6 月哥伦比

亚大学的政策对话倡议组织举办的一场国际会议上讨论过。第一章的某些观点则在 2004 年春牛津大学的坦纳讲座中讨论过。另外，我还要感谢巴塞罗那的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中心（CIDOB）基金会，该组织于 2004 年秋发起了有关“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的会议，会议上许多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本书的观点涵盖非常宽泛，很多议题都是我研究了长达 30 年之久的领域，在此期间积累的大量知识都要感谢许多人的帮助。第三章中关于贸易政策的研究我要感谢彼得·奥斯泽格（Peter Orszag），在我任职经济顾问委员会期间他和我一起仔细研究了倾销问题；同时也感谢我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帮助过我的艾伦·温特斯（Alan Winters）、迈克尔·芬格（Michael Finger）以及伯纳德·霍克曼（Bernard Hoekman）。第四章知识产权方面的研究我要特别感谢杰米·洛夫（Jamie Love）、迈克尔·格拉格（Michael Cragg）、保罗·戴维（Paul David）、乔瓦尼·多西（Giovanni Dosi）、马里奥·西摩里（Mario Cimoli）、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张夏准（Ha Joon Chang）以及知识产权署（IPD）知识产权专项工作组会议的所有参与者，另外还要感谢《创新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Innovation*）的几位合著者理查德·吉尔伯特（Richard Gilbert）、卡尔·夏皮罗（Carl Shapiro）、戴维·纽伯里（David Newbery）和帕萨·达斯古普塔（Partha Dasgupta）。这些人中有一部分也同我一起研究了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哥伦比亚的凯文·康拉德（Kevin Conrad）和杰夫·希尔（Geoff Heal），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理迈克尔·索马雷（Michael Somares），以及环境部长罗德里格斯（Rodriguez）在第六章中所提到的雨林联盟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迈克尔·托曼（Michael Toman）、艾伦·克鲁波尼克（Alan Krupnick）和雷·帕斯夸（Ray Squitieri）同我一起在经济顾问委员会研究全球变暖问题；鲁思·贝尔（Ruth Bell）特别帮忙审阅了第六章的最初版本。有关负债方面的问题研究我一定要感谢戴维·黑尔（David Hale）、巴里·赫尔曼（Barry Herman）、库尼贝特·拉夫（Kunibert Raffer）、迈克尔·杜利（Michael Dooley）、罗伯托·弗伦克尔（Roberto Frenkel）、约根·凯泽（Jurgen Kaiser）、苏珊·乔治（Susan George）以及知识产权署国家债务专项工作组会议的所有参与者。而全球储备体系建议、《清迈倡议》以及失败了的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尝试都曾经在斯德哥尔摩、华盛顿及其他地方的会议、研讨会以及学术报告中提及，因此我也要感谢这些研讨会的参与者，特别是乔治·索罗

斯本人也提出了相类似的提议。在与沈联涛 (Andrew Sheng)、榊原英姿 (Eusake Sakikabara) 讨论这些议题的同时,我自己也获益匪浅。

在研究阿拉斯加、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以及加利福尼亚这几个州的石油公司在实际运营中出现的问题时,我都获得了第一手的资料,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这次研究过程中我的伙伴杰夫·莱星格 (Jeff Leitzinger)。保持市场竞争性的这一挑战不管是理论上还是政策上都是我永久不变的研究议题;在我的合作伙伴中,史蒂芬·萨洛普 (Steven Salop)、贾森·弗曼 (Jason Furman)、巴里·奈尔伯夫 (Barry Nalebuff) 以及乔恩·奥斯泽格 (Jon Orszag) 对我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

另外,还有一些人我要致以特别的感谢。关于全球化的争论以及关于市场经济有限性问题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全球化也成为市场经济缺陷的核心部分。有一部分人 (应该说是很多) 不同意本书的观点;而我自己也在尽力地去仔细倾听那些反对的声音,同时去评估那些证据、分析那些模型,并理解这些反对观点的根本原因。我因此在胡佛研究所里耗时数年,在这个世界著名的传统派思想库中,与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乔治·施蒂格勒 (George Stigler) 和加里·贝克尔 (Gary Becker) 等大师进行探讨,对于他们的耐心和容忍我不胜感激。我担心他们有时会认为我去质疑那些他们已经认为是明显的或既定的观点,这已经超出了合理的怀疑范围;我更为担心的是,这些争辩的参与者忽视彼此的观点而仅仅是在捍卫自己的立场,担心他们更多的只是在召集自己的队伍而不去考虑在改变对手的思想中获胜。我猜想我也不能让更多的对手改变其立场,但是我认为我已经在努力开始着手这些问题,去揭示潜在的设想和价值观之间的差异。

过去的5年间,公众对于全球化的讨论尤其热烈,在此期间很多人贡献卓著,比如马丁·沃尔夫 (Martin Wolf) (《全球化为什么可行》(*Why Globalization Works*))、贾格迪什·巴格瓦蒂 (Jagdish Bhagwati) (《捍卫全球化》(*In Defense of Globalization*))、比尔·伊斯特利 (Bill Easterly) (《为增长逃避探求》(*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杰夫·萨克斯 (Jeff Sachs) (《贫困的终结》(*The End of Poverty*)) 以及托马斯·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 (《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不论是公开场合还是在私底下,我们之间都在继续争论这些问题,并且我深信即使我们没有办法让对方信服自己立场的优势,我们每个人都已从中受益匪浅。民主给了我们机会、我更认为应该是一种责